

语言学研究

跨言论元配置模式的识别与分裂模式

——汉语是中性模式语言吗？

于秀金

(山东财经大学 外国语学院, 山东 济南 250014)

摘要:世界语言结构地图集将包括汉语在内的孤立语归入中性模式语言,忽略了这类语言采用不同非形态手段呈现的论元配置模式,不利于论元结构的生成机制研究。若从不同形态类型语言小句论元配置模式的底层逻辑出发,可发现:1. 形态格标记不是世界语言中普遍存在的标记手段,格标记配置不是论元配置模式的唯一识别方式,在缺乏形态格标记的语言中,语序、一致关系、词汇等手段是确定论元配置模式的依据;2. 以往类型学界所主张的中性模式这个类型应取消,需重新审视被归为中性模式语言的汉语等孤立语的论元配置模式;3. 汉语是一种主-宾格为主兼具施-通格小句的分裂或混合模式语言。

关键词:论元配置模式;识别方式;分裂;主-宾格;施-通格

中图分类号:H00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6414(2026)05-0035-18

DOI:10.26922/j.cnki.waiguoyuwen.2026.05.003

0 引言

世界语言通常都拥有及物小句和不及物小句这两种小句类型,及物小句包含一个施事性论元(记作A)和至少一个受事性论元(记作P),不及物小句含有唯一的主事性论元(记作S)。国外类型学界提出小句论元的“格标记配置模式”(alignment pattern of case marking)试图回答世界语言中S、A、P三个论元在标记方式上的规律。国内学界对汉语是哪种配置模式的语言有分歧,目前主要有三种假设:混合模式语言(金立鑫等,2014;叶狂

基金项目: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类型学视角下汉语论元结构变异的句法-语义机制研究”(25CYYJ08)的阶段
性成果

作者简介:于秀金,男,山东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语言类型学研究。

引用格式:于秀金. 跨言论元配置模式的识别与分裂模式——汉语是中性模式语言吗? [J]. 外国语文, 2026(5): 35

-52.



本刊微信公众号

等,2017;金立鑫,2019;金立鑫 等,2019;于秀金 等,2020),中性语言(罗天华,2021,2023),作格语言^①(潘海华 等,2023)。

本文首先梳理国外类型学界有关跨语言小句的论元配置模式研究,明晰不足之处和值得借鉴的方面,再重新审视持中性模式语言的核心观点,最后指出汉语是一种主-宾格为主兼具施-通格小句的分裂或混合模式语言。

1 论元的格标记配置模式

类型学界很多研究将小句核心论元的形态格标记作为唯一标准,对比世界语言中不及物小句的唯一论元 S 和及物小句的两个论元 A 和 P 的格标记异同,提出论元 S、A、P 的五种格标记配置模式(Comrie,2013;Haspelmath,2011)。“alignment”常被译成“配置/对齐”,在“格标记配置”这个概念中,格标记主要限于狭义的格形态语素,配置/对齐则指不及物小句的唯一论元 S 和及物小句的 A 和 P 中的哪个论元采用相同的格形态。我们将五种格标记配置模式表示如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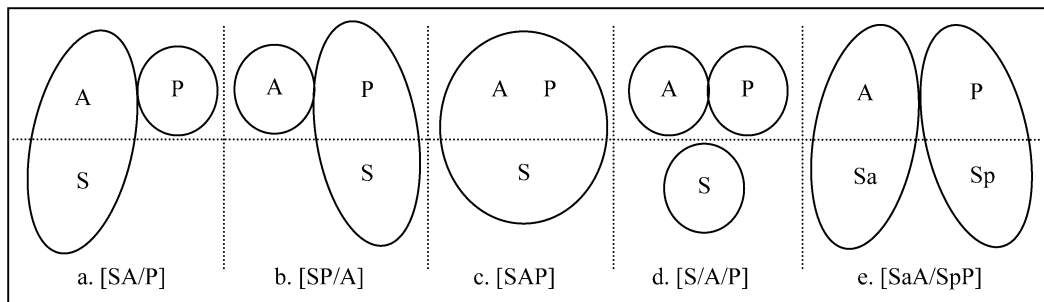


图 1 跨语言小句核心论元 S/A/P 的格标记配置模式

在图 1 中,同一图形中的论元表示采用相同的格标记,不同图形中的论元表示采用不同的格标记,这五种格标记配置模式的命名如(1):

- (1) a. 主-宾格模式(nominative-accusative):[SA/P]
- b. 施-通格模式(ergative-absolutive):[SP/A]
- c. 中性模式(neutral):[SAP]
- d. 三分模式(tripartite):[S/A/P]
- e. 活动-非活动模式(active-inactive):[SaA/SpP]

WALS 网站上(Comrie,2013)^②统计了 190 种语言,其中 182 种语言采用主-宾格、施-通格以及中性这三种模式,4 种语言采用三分模式,另有 4 种语言采用活动-非活动模式,

① “ergative”有学者译为“施格”,也有学者译为“作格”。本文主张采用“施格”译法,为尊重引文,直接引用或叙述或反驳中文文献有关观点时保留原作者使用的“作格”。

② The World Atlas of Language Structures (WALS),网址为 <https://wals.info/>,该网站是语言类型学界权威的大型语言结构特征数据库,涉及到 2560 种语言,语言结构特征共 140 个参项,涵盖语音、形态、句法以及语序等。

这 190 种语言都依据形态格来识别,世界所有孤立语(isolating language)都归入中性模式,主要分布在非洲中南部、中国和东南亚、巴布亚新几内亚以及南北美洲,其中汉语、泰语、缅甸语等孤立语都被归为中性语言。下面看看这五种格标记配置模式的具体表现。

第一,主-宾格模式:不及物小句的唯一论元 S 和及物小句的论元 A 采用相同的格标记,P 采用其他格标记,如土耳其语(Turkish):

(2) 土耳其语(Handschuh, 2014:5-6)

- a. Adam gel-di.
男人. 主格(S) 来-过去时
那个男人来了。
- b. Öğretmen adam-t gör-dü.
老师. 主格(A) 男人-宾格(P) 看见-过去时
老师看见了那个男人。

第二,施-通格模式:不及物小句的唯一论元 S 和及物小句的论元 P 采用相同的格标记,A 采用其他格标记,如迪尔巴尔语(Dyirbal):

(3) 迪尔巴尔语(Dixon, 1994:10)

- a. ŋuma banaga-nyu.
父亲. 通格(S) 返回-非将来时
父亲返回了。
- b. ŋuma yabu-ŋgu bura-n.
父亲. 通格(P) 母亲-施格(A) 看见-非将来时
母亲看见了父亲。

第三,中性模式:不及物小句的唯一论元 S 和及物小句的论元 A 和 P 都采用相同的格标记(包括零形态),如泰语(Thai)的三个论元均采用零形态:

(4) 泰语(Smyth, 2002:96, 116)

- a. Khun phûut chát.
你. Ø(S) 讲话 清楚
你讲话清楚。
- b. Chán rák khun.
我. Ø(A) 爱 你. Ø(P)
我爱你。

第四,三分模式:不及物小句的唯一论元 S 和及物小句的论元 A 和 P 三者采用不同的格标记,如塞梅莱语(Semelai)^①:

① 从语言经济性原则的角度看,类似塞梅莱语中的这种三分模式产生了格标记的冗余问题,及物小句中的两个论元 A 和 P 很有必要采用某种手段进行区分,但不及物小句只有一个论元 S, S 完全可采用和 A 或者 P 相同的标记方式。这是三分模式在世界语言中罕见的主要原因。

(5) 塞梅莱语 (Kruspe, 2004: 255, 264)

a. K^hbəs pəɖəŋ ke.

死 老虎. Ø(S) 那

那只老虎死了。

b. Ki-bukɔ? la-knlək hn-pintu?.

第三人称. 施事-打开 施格-丈夫(A) 宾格-门(P)

丈夫打开了门。

第五, 活动-非活动模式: 在不及物小句中, 有的 S(记作 Sa) 和 A 采用相同的格标记, 有的 S(记作 Sp) 和 P 采用相同的格标记, 如巴斯克语 (Basque)^①:

(6) 巴斯克语 (Etxepare, 2003: 364)

a. Jon-ek saltatu du.

约翰-施格(Sa) 跳 助动词

约翰跳了。

b. Jon etorri da.

约翰. 通格(Sp) 来 助动词

约翰来了。

c. Jon-ek ardoa ekarri du.

约翰-施格(A) 酒. 限定词. 通格(P) 带来 助动词

约翰带来了酒。

2 论元配置模式概念的提出

冰岛语 (Icelandic) 是拥有格标记的主-宾格为主语言, 其及物小句的基础语序是 [AVP] (即传统语法中的 SVO), 但语序相对自由, 格标记已标示论元的施事性和受事性身份, 语序或句法位置不能代替格标记的功能, 如:

(7) 冰岛语 (Thráinsson, 2007: 21)

a. María elskar Harald.

玛丽. 主格(A) 爱. 第三人称单数 哈罗德. 宾格(P)

玛丽爱哈罗德。

b. Harald elskar María.

哈罗德. 宾格(P) 爱. 第三人称单数 玛丽. 主格(A)

① 学界一般将巴斯克语归为施-通格为主语言, 这可从巴斯克语小句论元的格标记上看出, 而 WALS 网站将其归为活动-非活动模式的语言, 主要是考虑到含不同动词的不及物小句的唯一论元 S 在格标记上产生了分裂现象, 在含强施事性动词的不及物小句中, S 标示为施格, 在含弱施事性动词的不及物小句中, S 标示为通格。总体而言, 活动-非活动模式可发生在施-通格模式为主语言中, 也可发生在主-宾格模式为主语言中。活动-非活动模式是否有必要设立, 尚需在较大语种样本中进行论证。

玛丽爱哈罗德。

- c. Bankinn opnaði klukkan nú.
 银行-定冠词. 主格(S) 开. 过去时 点 9
 银行 9 点开门了。

(7a-b)是含论元 A 和 P 的及物小句,(7c)是含唯一论元 S 的不及物小句。论元 S 和论元 A 带相同的主格标记,论元 P 带宾格标记,是主-宾格模式。从(7a-b)可看出,论元 A 和论元 P 可调换句法位置,但不影响主格的“玛丽”始终是施事性论元 A,宾格的“哈罗德”始终是受事性论元 P,这显然是主格标记和宾格标记起了决定性作用。

世界语言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是,形态格标记不是所有语言普遍存在的标记手段,格标记配置不是识别主-宾格或施-通格等模式的唯一方式,最典型的例子是世界语言中缺乏形态语素的孤立语,如汉语:

- (8)a. 小王(A)打了小李(P)。
 b. 小李(A)打了小王(P)。
 c. 小王(S)睡醒了。

(8)中小句的论元没有格标记,但不影响论元的语义识别。(8a-b)是含 A 和 P 两个论元的及物小句,(8c)是含唯一论元 S 的不及物小句。(8a-b)中决定施事性论元 A 还是受事性论元 P 的因素是句法位置,动词“打”之前的论元是 A,动词“打”之后的论元是 P。不及物小句(8c)的唯一论元 S 位于动词“睡醒”之前。因此,S 和 A 拥有相同语法地位,而 P 单独拥有不同的语法地位,这显然是缺乏形态格的主-宾格模式。

学界通常认为英语是一种比较典型的屈折语,但世界上几乎没有一种语言的形态类型是单纯或绝对的,不排除某类型的语言中有其他类型语言的个别属性(金立鑫,2011:15)。根据有关不同形态类型语言的历时演变阐述(Dixon,1997:41-42),我们认为,现代英语的形态类型已脱离屈折语阶段,开始逐渐向孤立语方向演变,从古英语到现代英语经历了屈折语素逐渐消失的过程,少数屈折语素是古英语在现代英语中的滞留。如现代英语的第一/三人称的宾格形态在论元的语义表征中作用不大,而是句法位置替代格标记的功能,句法位置标识论元是施事性论元还是受事性论元,如:

- (9)a. Mary (A) loves Harold (P).
 b. * Harold (P) loves Mary (A).
 c. Mary (A) loves him (P).
 d. * Him (P) loves Mary (A).

英语不像冰岛语那样随意调换 A 和 P 的句法位置。在(9a-b)中,A 和 P 均采用零形

态,但句法位置决定 A 为主格,P 为宾格,A 位于动词之前,P 位于动词之后。在(9c-d)中,A 采用零形态,P 采用宾格形态,A 和 P 即使有格标记的形态区分,但它们的句法位置仍固定,本质上决定“him”为宾格的是动词后位置,而非“him”的形态本身。

句法结构中句法语义角色是“第一性”的,形态是后起并用于标记句法语义角色的,任何区分句法语义角色的形式都是一种句法形态。已有不少类型学者(如 Dixon, 1994; Whaley, 1997; Bickel et al., 2009)看到这一点并指出,在缺乏形态格标记的语言中,语序可代替格标记的功能,根据不及物句的唯一论元 S 是和及物句的论元 A 还是论元 P 拥有相同的句法位置,形成主-宾格或施-通格等模式。

基于该理念,格标记配置只能涵盖部分语言,语序等句法分布手段也可呈现主-宾格或施-通格模式。由此我们主张采用“论元配置模式”(argument alignment pattern)这个概念(Bickel et al., 2009:306; 金立鑫, 2019:32)来统称各语言通过格标记配置、语序配置、一致关系配置等来呈现的主-宾格或施-通格等模式。

3 论元配置分裂模式

从形态格、语序、一致关系、词汇等手段来看世界语言的论元配置模式,大多数语言都采用一种模式为主而另一种模式为辅的分裂模式,世界几乎没有语言完全采用施-通格模式或主-宾格模式(金立鑫, 2026)。已有很多关于“分裂施格”(split ergativity)或“分裂格标记模式”(split case-marking pattern)的研究探讨施-通格为主语言中的主-宾格或其他模式(如 Comrie, 1978; Singh, 1994; Malchukov, 2015)。格鲁吉亚语(Georgian)和印地语(Hindi)是施-通格为主语言,两种语言中时和体的差异会导致分裂施格现象,格鲁吉亚语过去时用施-通格模式,非过去时用主-宾格模式,如(10);印地语完成体用施-通格模式,而未完成体用主-宾格模式,如(11):

(10) 格鲁吉亚语(Comrie, 1978:351-352)

- | | | |
|---------------|---------|----------|
| a. Student-ma | ceril-i | dacera. |
| 学生-施格 | 信-通格 | 写(不定过去时) |
| 学生写完了信。 | | |
| b. Student-i | ceril-s | cers. |
| 学生-主格 | 信-宾格 | 写(现在时) |
| 学生在写信。 | | |

(11) 印地语(Singh, 1994:93-94)

- a. Sheer-ne aadmii-Ø khaayaa.
 狮子-施格 人-通格 吃(完成体)
 狮子吃了人。
- b. Sheer-Ø aadmii-ko khaataa hai.
 狮子-主格 人-宾格 吃(未完成体) 助动词
 狮子吃人。

不同理论背景的学者所关注的语言以及所采用的术语不同,也有很多学者使用“unaccusativity”或“ergativity”的术语探讨主-宾格为主语言中的论元结构问题(如 Grewendorf, 1989; Kishimoto, 1996; Lemmens, 1998)。顺带说明:第一,中文术语名称,吕叔湘(1987)将“ergative”译成“作格”,此后很多学者沿用这个译法,但很多类型学者将其译为“施格”(朱晓农, 2008; 陆丙甫, 2009; 罗天华, 2011; 金立鑫等, 2014; 于秀金等, 2020),如金立鑫等(2014: 46-47)指出, ergative 语言就是动作的施事有 ergative 格标记的语言, ergative 应被称为“施格”才最准确;第二,描写对象,“非宾格假说”(unaccusative hypothesis)(Perlmutter, 1978)将英语一元动词分为非宾格动词(unaccusative verb)和非施格动词(unergative verb),前者如(12a)中的一元非宾格动词“break/sink”,后者如(12b)中的一元非施格动词“cry/sleep”:

- (12) a. The window broke. /The ship sank.
 b. The baby cried. /The boy slept.

一元非宾格动词有对应的表致使义的及物动词用法(如“He broke the window”),但及物形式不属于一元非宾格动词,一元非施格动词没有及物动词的用法。非宾格假设在生成语法管约论框架下得到进一步发展,但使用的是“ergative”这一术语(Burzio, 1986)。黄正德(2008)认为汉语非宾格动词和非作格(即非施格)动词除了一元外,还有二元和三元,韩景泉(2019)则主张非宾格假说下的非宾格动词只有一个直接内论元,而无外论元且不具备赋格能力,只有回归到一元动词的论元结构框架下才能还原汉语非宾格动词的本来面貌。

从世界施-通格语言的事实来看,带“ergative”格标记论元的动词通常还带另一个通格(absolutive)论元,非宾格动词或施格动词(Perlmutter, 1978; Burzio, 1986)实际为通格动词,因为施-通格语言中的通格动词只带一个通格论元。

4 论元配置模式的识别方式

以往有研究主张除形态格外还可利用其他手段来识别论元配置模式,如信息结构、词汇、

一致关系、句法(包括基础语序)等手段。

信息结构方面,有学者(Du Bois,1987)从信息结构角度探讨一种玛雅语——萨卡普尔特克语(Sacapultec)中主-宾格和施-通格的使用规律,但有跨语言研究(Haig et al.,2016)表明该识别方式不具跨语言普适性。

词汇方面,功能词(*particle*)^①或附置词(*adposition*)是识别论元配置模式的主要词汇手段(Dixon,1994:41-49)。南岛语系萨摩亚语(*Samoan*)是施-通格模式为主且缺乏形态格标记的孤立语(Ochs,1982:649),其及物小句有[VAP]和[VPA]两种基础语序,不及物小句只有[VS]一种基础语序。也就是说,及物小句的论元A和P都位于动词后,那么便产生不及物小句动词后的唯一论元S如何和及物小句的论元P进行配置的问题,该语言采取的手段是,及物小句的论元A之前有一个功能词“e”,而论元P和不及物小句的论元S之前没有任何功能词,从而使论元S和论元P拥有相同语法地位,呈现施-通格模式。

一致关系方面,在区分论元层面上语序比一致关系更有优势,在所指标引(referent indexing)层面上一致关系比语序更有优势(Siewierska et al., 2009:295)。但这并不意味着动词上标示的论元的人称、性、数的属性不能呈现论元的配置模式。玛雅语——萨卡普尔特克语(Sacapultec)是施-通格模式为主的语言,其论元配置模式通过动词上标示的论元的人称和数的一致关系来呈现(Du Bois, 1987; McGregor, 2009),如:

(13) 萨卡普尔特克语 (Du Bois, 1987: 809-810)

a. Š-	ax-	war-	ek.
完结-	第一人称复数. 通格-	睡觉-	不及物后缀
我们(S)睡过觉。			

b. Š-ax-	a :-	kuna :-	x.
完结-第一人称复数. 通格-	第二人称单数. 施格-	治愈-	及物主动态
你(A)治愈了我们(P)。			

(13a)是不及物小句,动词上用前缀“ax”标示唯一论元S的人称和数,(13b)是及物小句,动词上用前缀“ax”标示受事性论元P的人称和数,而用前缀“a:”标示施事性论元A的人称和数。也就是说,不及物小句的论元S和及物小句的论元P拥有相同的语法地位,施事性论元A有独立的语法地位,为施-通格模式。

句法方面,世界语言的论元配置模式还可从句法方面来识别,句法上论元的配置模式

① 有学者(如 Matthews, 1997: 267)将“particle”定义为很多语言中缺乏形态变化的、简短的并且很难归入其他词类的词,有时指附着词(clitics)。汉语传统语法中一般将“particle”译作“助词”或“小品词”,由于世界语言的词类划分不统一以及语法成分的复杂性,我们从跨语言的角度译为“功能词”,主要指本身没有形态变化、词汇意义不凸显、起着某种语法功能作用的封闭性词类。

可依据基础语序、论元共享、并列删减以及关系化的可及性等方面来识别(Bickel et al., 2009)。迪尔巴尔语(Dyirbal)是施-通格为主语言,及物小句的论元 A 带施格标记;当不及物小句和及物小句有共享的论元(所指相同且带相同格标记),两个小句并列时,共享的论元可省略,无法共享的论元不可省略,如:

(14) 迪尔巴尔语(Dixon, 1994:162)

- a. η uma banaga-nyu yabu- η gu bura-n.
 父亲. 通格 返回-非将来时 母亲-施格 看见-非将来时
 父亲返回了, 母亲看见了他。
- b. * η uma banaga-nyu yabu bura-n.
 父亲. 通格 返回-非将来时 母亲-通格 看见-非将来时
 父亲返回了, 看见了母亲。

(14a)合格,两个并列小句共享带通格的“ η uma(父亲)”,在第二个小句中可省略;(14b)不合格,两个并列小句无法共享论元,尽管所指相同,但格标记不同,第一个小句的“ η uma(父亲)”是通格,而第二个小句的“ η uma(父亲)”是施格,带施格的“ η uma(父亲)”不可省略。上述论元共享和并列删减测试与其说是识别论元配置模式的手段,不如说是某种论元配置模式的句法限制。下面看基础语序识别论元配置模式。

在基础语序中,若不及物小句和及物小句采取[SV]/[AVP]或者[VS]/[PVA]语序,则是主-宾格模式,即论元 S 和论元 A 占据相同的句法位置;若不及物小句和及物小句采取[SV]/[PVA]或者[VS]/[AVP]语序时,则是施-通格模式,即论元 S 和论元 P 占据相同的句法位置(Dixon, 1994:49-50)。依据这种识别方式,可将(15)中不及物小句的论元 S 和及物小句的论元 A 进行句法配置,从而识别为[SA/P]的主-宾格模式:

(15) a. The cat (S) is sleeping.

b. John (A) finished the work (P).

由于世界语言句法结构的多样性,上述有关基础语序识别主-宾格模式和施-通格模式的方式并没有涵盖世界语言的所有语序方式(Dixon, 1994:52),如南美洲亚马孙河流域的萨努玛语(Sanuma),该语言缺乏形态格标记,通过其他语序方式呈现施-通格模式,其不及物小句和及物小句的基础语序分别是[SV]和[APV],因为及物小句的两个论元 A 和 P 都位于动词前,不及物小句的唯一论元 S 无法和其中一个论元进行句法配置,但如果不及物小句和及物小句都含有一个非核心的名词性论元(记作 X),则两个小句的语序分别采用[XSV]和[AXPV]。可以看出,不及物小句的论元 S 和及物小句的论元 P 都位于 X 之后,

而论元 A 单独位于 X 之前,从而使 S 和 P 进行句法配置。

语序识别论元配置模式不仅适用于缺乏形态格标记的语言,也适用于一些具有形态格标记的语言。一些施-通格为主语言不仅能通过形态格标记来呈现施-通格模式,还可通过语序来呈现(Dixon, 1994: 49-52),如苏丹南部的一种西尼罗河语——帕里语(Päri),不及物小句的论元 S 和及物小句的论元 P 都是零形态通格,及物小句的论元 A 带形态施格标记,这种[SP/A]的施-通格模式也可通过基础语序[SV]和[PVA]呈现,其中 S 和 P 有相同配置,如:

(16) 帕里语(Dixon, 1994: 51)

a. Ûbúr á-túuk.

乌伯. 通格 完结-玩

乌伯玩完了。

b. Jòobi á-kèel ùbúrr-i.

水牛. 通格 完结-射击 乌伯-施格

乌伯射杀了水牛。

巴西境内的一种加勒比语——马库西语(Makusi)与帕里语类似,形态格标记和基础语序均呈现施-通格模式,如:

(17) 马库西语(Whaley, 1997: 157)

a. Pemonkon-yami witi-pi.

男人 - 复数 离开-过去时

男人们离开了。

b. Tuna ekaranmapo-pi uuri-ya.

水 请求-过去时 我-施格

我要水了。

5 罗天华主要观点的不足

对于汉语论元配置模式,罗天华(2023)沿用WALS网站上的中性模式这个概念,认为汉语核心论元全无形态格标记,也没有A/S/P^①的归并与区分,汉语不是句法混合型语言,而是中性语言。我们认为该文的主要观点值得重新审视,下面简要分析。

1) 观点一:汉语没有核心论元 A/S/P 的归并与区分,是中性语言。

对于 A/S/P 的归并与区分,汉语缺乏形态手段不代表缺乏其他手段。很多类型学者

① 原文献用 A/S/O,本文统一用 A/S/P。类型学界有学者用 A/S/O(如 Dixon, 1994),有学者用 A/S/P(如 Haspelmath, 2011)。

(如 Dixon, 1994:49-52; Whaley, 1997:157; Bickel et al., 2009:305) 明确指出, 在缺乏形态格标记的语言中, 基础语序可代替格标记的功能, 根据不及物句的论元 S 是和及物句的论元 A 还是论元 P 拥有相同语法位置, 呈现主-宾格或施-通格等模式。从有无形态格标记角度命名的中性模式这个概念具有误导性, 不利于识别不同形态类型语言的论元配置模式, 所谓的中性模式掩盖了缺乏形态格的语言用其他手段来归并与区分 A/S/P。如前文第 3 节所述, 无论采取何种手段, 未见 A 和 P 无法区分的语言。

金立鑫(2019)赞同方光焘(1997)的句法分布是广义语法形态的主张, 句法分布可用来分析论元配置模式或论元结构。该观点与生成语法中的抽象格或结构格(Chomsky, 1981)本质一致。金立鑫(2020, 2022)进一步质疑无标记的中性模式在逻辑上的真实性, 认为 WALS 网站上的处理忽视了广义句法形态中施事与受事的句法位置分布形态, 所谓 A/S/P 这三个论元共用同一个标记, 如前所述并不存在, 汉语句法形式上是二分标记模式, 即动词前和动词后两种标记模式。

2) 观点二: 作格句法(ergative syntax)^①不同于句法作格(syntactic ergativity), 前者是句法学(形式语言学)中的作格(非宾格)现象, 后者是类型学中的概念。

第一, 我们赞同作格句法和句法作格不同, 但不建议从不同理论流派和其研究对象角度作出区分。实际上作格句法主要指某一语言中存在某些句法特征体现的作格模式(即施-通格模式), 但不表明该语言就是作格为主语言, 而句法作格主要指作格语言(即施-通格为主语言)中的“句法现象”(Comrie, 1978:343)或“句法限制”(Dixon, 1994:143)。

第二, 作格句法的说法不是句法学或形式语言学的专有概念, 在类型学界早有提及, 如“ergative syntax”和“accusative syntax”(Dixon, 1994:11), 前者指[SP/A]配置模式, 后者指[SA/P]配置模式。

第三, 生成语法中“unaccusative verb”的说法主要是指一类动词异于主-宾格模式中的常规动词, 而“ergative”这个概念应是借用施-通格为主语言中的术语, 在论元配置模式的框架下回归这类动词的本来面目并非创造新术语。

第四, 以往诸多研究指出(Comrie, 1978), 世界没有哪种语言的语法规则完全单一遵守主-宾格或施-通格或其他模式, 几乎每种语言都有混合性。但不同形态类型的语言如何呈现论元配置模式、混合程度如何、受何因素制约的混合等正是类型学的研究兴趣。罗天华(2023:9)主张, 作格句法主要关涉动词的语义, 是形式语言学关注的现象, 与类型学的

① 为方便讨论和避免误解, 本节在叙述和反驳相关中文文献的观点时, 仍用该文献的“作格”(ergative)这一译法。

理论背景全然不同。但是,动词的语义差异正是制约类型学中论元配置混合模式的重要因素之一,即制约分裂系统的“动词的语义性质”(semantic nature of the verb)(Dixon,1994:70),动词的语义差异会导致不同的论元配置模式。

3)观点三:句法作格是形态作格的次类,有句法作格必有形态作格,汉语没有形态作格,也就没有句法作格。

我们不赞同该观点,句法作格和形态作格是识别作格模式的两条不同路径,不存在包含问题和蕴含共性现象,一些重要文献基本都将两者分开讨论(如 Comrie,1978;Dixon,1994;McGregor,2009),这些研究对句法作格的定义大致相似:在句法层面上将 S 和 P 等同处理以区别于 A。至于何为“句法”,诸多研究未作限定。对于句法作格,有学者主要讨论了施-通格为主语言中小句合并时 S 与 P 等同并区别于 A 的句法限制(如 Dixon,1994:143)。我们认为,这种句法限制并非识别论元配置模式的标准,如罗天华(2023:9)也认为句法作格概念本身存在模糊不清的问题,不是一个有价值的参项。

实际上,句法作格和句法主格(syntactic nominativity)的概念早有学者提出(Comrie,1978:343),前者指有些语言中的一些“句法现象”将 S 与 P 等同并区别于 A,后者指有些语言中的一些“句法现象”将 S 与 A 等同并区别于 P。此处的“句法现象”(Comrie,1978)与小句合并“句法限制”(Dixon,1994)不同,如一种东北高加索语——坎纳鲁格语(Khinalug):

(18)坎纳鲁格语(Comrie,1978:344-345)

- a. Ligild sacaX-Ø -q'iqomä.
男人.通格 沉默 -阳性
那个男人沉默了。
- b. Bij-i riši ti -zk''i.
父亲-施格 女儿.通格 叫醒 -阴性
父亲叫醒了女儿。
- c. As jukwešämä endžik -ondä.
我.与格 想.过去时 堕落 -不
(当时)我不想堕落。
- d. Asir gada točkwi jukwat^hmä.
我.与格 男孩.通格 起床 想
我要那男孩起床。

(18)作如下解读(Comrie,1978:344-345):(18a-b)表明,坎纳鲁格语是形态上的施-通

格为主语言,即[SP/A]配置模式。但(18c-d)呈现句法上的主-宾格[SA/P]模式,即句法主格,具体原因是:当非限定从属性动词的主语和主要动词的主语相同时,非限定从属性动词的主语作省略处理,当两者不同时,必须出现。也即,两个动词共享的论元可省略,无法共享的论元不可省略。这说明,S和A被等同对待,以区别于P。(18c)中,主要动词“想”和从属性动词“堕落”共享句法上的论元“我”;(18d)中,主要动词“想”和从属性动词“起床”无法共享论元,两个论元都需出现。可见坎纳鲁格语采用形态施-通格和句法主-宾格。

综上,坎纳鲁格语有句法主格,但没有形态主格。同理,世界上也存在有句法作格而无形态作格的语言。如果一语言不及物小句和及物小句采取[SV]/[PVA]或者[VS]/[AVP]的基础语序时,则为施-通格模式(Dixon, 1994:49-50)。巴西境内的一种缺乏形态的孤立语——阿普里纳语(Apurinã)就是有句法作格而无形态作格的语言:

(19) 阿普里纳语(Facundes, 2000:281)

a. U muteka kuku.

第三人称. 阳性 跑 男人

那个男人(S)跑了。

b. Hātako ro apa nanu ru aōtu.

女孩 阴性 取 进行体 第三人称. 阳性 水果

那个女孩(A)正在取水果(P)。

阿普里纳语中不及物小句采用[VS]语序,及物小句采用[AVP]语序,呈现句法上的施-通格[SP/A]模式。由此汉语同样可通过基础语序来识别论元配置模式。

4) 观点四:汉语作格研究言必称“把”字句,如果考虑到把字句的主观性特点,不妨删繁就简,将其视为一种表示主观处置的语用句式。

现代汉语“把”字句不能简单认为是一种“语用句式”,而是语法系统中的重要“基础句式”。语用句式一般指共时语言研究中由于某种语用因素而临时调整的句式,语用句式是派生句式,它来自基础句式,如派生句式“法国我去过”([PAV]语序)来自基础句式“我去过法国”([AVP]语序),前者是宾语话题化因素产生的语用句式。

如果说“把”字句是因主观处置因素产生的语用句式,那么“把”字句从何句式派生而来?如果认为来自[AVP]语序主动宾句的临时语用调整,但通常认为,“把”字句历时上来源于连动句[A把PVP](如“把酒临风”)(Bennett, 1981;王力, 1990;Sun, 1996)。沈家煊(2002:396)也指出,“把”字句中的“把”字由动词虚化为介词,连动式演变为处置式,这个

过程是一种主观化的过程。张伯江(2014:598)也没有说“把”字句是一种语用句式,而是主张它是汉语语法系统中一种偏重主观化表达、具有特殊语用价值的句式,不与一般语法理论中所谓“句法过程”相关。实际上吕叔湘(1948/1984:188)早就指出,动词后面紧接着一些成分,不容许宾语插在中间,这个条件才是近代汉语里发展“把”字句的推动力。也就是说,很多“把”字句是句法决定的,无法回到主动宾句式的宾语位置,很多把字句不需要语用驱动,如:

- (20)a. 妈妈把面包掰成了两半。(* 妈妈掰面包成了两半)
b. 小王把车子开进了沟里。(* 小王开车子进了沟里)
c. 他们把产品卖到了欧洲。(* 他们卖产品到了欧洲)
d. 她把欢乐带给了孩子们。(* 她带欢乐给了孩子们)

(20)表明,“把”字句的形成有时是出于句法结构的强制性要求,而非单纯的语用选择。另根据张伯江(2019),“把”字句在汉语里有上千年的历史,汉族儿童两岁多就开始说“把”字句,应用范围广,使用频率高。因此,可以说,现代汉语“把”字句不是基于主动宾句式的语用句式,而是经历长期演变而固化的且具有重要语法地位的基础句式。

6 汉语论元配置分裂模式

跨语言论元配置模式分裂的制约因素曾有详细阐述(Dixon, 1994; McGregor, 2009),这些因素包括动词的语义性质、核心论元的语义性质、时-体-情态、小句的语法地位(如主句或从句)。其中动词语义性质制约的分裂是指不及物动词的语义差异,一部分不及物小句的论元S和及物小句的论元A拥有相同的语法地位,即[SaA/P]模式,另一部分不及物小句的论元S和及物小句的论元P拥有相同的语法地位,即[SpP/A]模式。不同学者对这种现象采用不同的术语,如活动-非活动模式(Comrie 2013a)、分裂不及物(split intransitivity)(Van Valin, 1990)、分裂-S(split-S)(Dixon, 1994)。 $[SaA/P]$ 模式常用于施事性强的活动动词,如“爬/跑”,而 $[SpP/A]$ 模式一般用于施事性弱的状态动词,如“坐(着)”,或者意外发生的事件,如“跌倒”(McGregor, 2009:487)。需注意的是,不及物动词的施事性语义性质不是固定的,有些语言中同一个不及物动词会因为施事性强弱或主观性等原因使论元S带有不同的格标记,如格鲁吉亚境内巴茨比语(Batsbi)中的不及物动词“跌倒”,若表示“无意跌倒”,则小句的论元S用通格,若表示“故意跌倒”,则小句的论元S用施格。

汉语算不上形态丰富的语言,但句法形式丰富(陈满华,2026)。从论元配置模式上看,汉语是主-宾格为主兼具施-通格结构的分裂模式的语言,该分裂模式主要由动词的语

义性质或不同类型的动词所制约。根据汉语小句基础语序, S、A、P 三个论元在句法位置上的配置/对齐, 形成了主-宾格[SA/P]和施-通格[SP/A]两种模式, 分别如表 1 和表 2:

表 1 汉语中的主-宾格模式[SA/P]

论元	小句	基础语序
二元	主-宾格小句	[A _{NOM} V/VC P _{ACC}]
一元	主格小句	[S _{NOM} V/VC]

表 2 汉语中的施-通格模式[SP/A]

论元	小句	基础语序
二/三元	施-通格小句	[A _{ERG} 把 P _{1ABS} V/VC (P _{2ABS})]
一元	通格小句 1	[V/VC S _{ABS}]
一元	通格小句 2	[S _{ABS} V/VC]

在两个表中, V/VC 表示动词/动结式, NOM 和 ACC 分别表示主格和宾格, ERG 和 ABS 分别表示施格和通格。表 2 中将“把”字句处理为施-通格小句, 这只是论元配置所体现的, 对于“把”字句的观点和论证可参阅其他已有研究(叶狂等, 2012, 2018; 张伯江, 2014; 金立鑫等, 2019; 于秀金等, 2023)。两个表中呈现的分裂模式受不同类型动词/动结式的制约, 如:

(21) 出现在主-宾格模式中的动词/动结式

- a. 非存现/非起始 V/VC: 妈妈休息了。 孩子们在游泳。 (主格小句)
- b. 非致使 V/VC: 老师喜欢这本书。 学生离开了教室。 (主-宾格小句)
- c. 致使 V/VC: 小明打破了杯子。 爸爸煮糊了稀饭。 (主-宾格小句)

(22) 出现在施-通格模式中的动词/动结式

- a. 存现/起始 V/VC: 来客人了/客人来了。 跑了两个犯人/两个犯人跑了。 (通格小句)
- b. 致使 V/VC: 小明把杯子打破了。 爸爸把稀饭煮糊了/煮成了干饭。 (施-通格小句)

(21) 和 (22) 表明, 致使动词/动结式可出现在主-宾格和施-通格两种模式中, 但非致使动词/动结式只能出现在主-宾格模式中, 不能出现在施-通格模式中(“* 老师把这本书喜欢/ * 学生把教室离开了”)。从不同类型动词/动结式出现在不同模式中的格局上看, 汉语主-宾格模式比施-通格模式的应用范围更广, 总体呈现主-宾格为主、施-通格为辅模式。

7 结语

语言本体研究有三点需注意: 一是应批判性地看待国外学界相关研究, 二是不同理论

学派对同一问题的研究应避免两张皮现象,三是提出的方案应能解决以往不能解释的问题。总体来看,以往研究主要存在以下不足:第一,形态格标记不是世界语言中普遍存在的标记手段,格标记配置不是识别主-宾格或施-通格等模式的唯一方式,在缺乏形态格标记的语言中,可通过语序、一致关系、词汇等手段来识别这些模式;第二,以往类型学界所主张的中性模式应取消,即使论元 S/A/P 上都无形态格标记,它们也不具有相同的句法地位;第三,不同理论框架的研究所关注的句法现象本质上属于论元配置模式问题,如在“分裂施格”下探讨施-通格为主语言中的主-宾格结构,也有在“非宾格”或“施(作)格”下探讨主-宾格为主语言中的有关现象;第四,国内学界对汉语小句的论元结构争论颇多,缺乏一个统一理论框架来解释各种论元结构难题,本文主张的论元配置模式是一个值得参考的理论假设。

参考文献:

- 陈满华. 2026. 关于“形态”与“黏着”的界定问题——兼评《汉语的形态》及汉语形态丰富说[J]. 外国语文(3): 12-28.
- 方光焘. 1997. 方光焘语言学论文集[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韩景泉. 2019. 汉语非宾格动词的论元结构及其句法推导[J]. 外语教学与研究(1): 31-43.
- 黄正德. 2008. 题元理论与汉语动词题元结构研究[G]//沈阳, 冯胜利. 当代语言学理论和汉语研究.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36-161.
- 金立鑫. 2011. 什么是语言类型学[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 金立鑫. 2019. 广义语法形态理论的解释力——对普通话语序类型与论元配置类型的描写与解释[J].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 32-43.
- 金立鑫. 2020. 施通格论元组配类型的逻辑分析[J].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6): 3-23.
- 金立鑫. 2022. 地理分布、气候特征对语言结构模式的影响[J]. 南开语言学刊(2): 110-122.
- 金立鑫. 2026. 施格、宾格及其演化趋势[J]. 外国语文(4): 1-19.
- 金立鑫, 崔圭铤. 2019. “把”字句的结构功能动因分析[J]. 汉语学习(1): 3-12.
- 金立鑫, 王红卫. 2014. 动词分类和施格、通格及施语、通语[J]. 外语教学与研究(1): 45-57.
- 陆丙甫. 2009. 从某些语言学术语的翻译谈起[J]. 外国语(2): 2-7.
- 罗天华. 2011. 施格语言的形态-句法关联[D].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罗天华. 2021. 汉语是作格语言吗? ——作格格局是什么和不是什么[J]. 当代语言学(1): 114-129.
- 罗天华. 2023. 汉语是句法混合型语言吗?[J]. 外国语(3): 2-12.
- 吕叔湘. 1984. 把字用法的研究[G]//汉语语法论文集(增订本).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76-199.
- 吕叔湘. 1987. 说“胜”和“败”[J]. 中国语文(1): 1-5.
- 潘海华, 叶狂. 2023. 汉语真的不是作格语言吗?[J]. 语言学论丛(2): 3-21.
- 沈家煊. 2002. 如何处置“处置式”? ——论把字句的主观性[J]. 中国语文(5): 387-399.
- 王力. 1990. 汉语语法史[M]. 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

- 叶狂, 潘海华. 2012. 把字句的跨语言视角[J]. 语言科学 (6): 604-620.
- 叶狂, 潘海华. 2017. 从分裂作格现象看汉语句法的混合性[J]. 外语教学与研究 (4): 526-538.
- 叶狂, 潘海华. 2018. 逆动式的最新研究及把字句的句法性质[J]. 语言研究 (1): 1-10.
- 于秀金, 金立鑫. 2020. 类型学视角下汉语的混合格配置模式[J]. 外国语 (5): 30-45.
- 于秀金, 姜兆梓. 2023. 跨语言论元配置模式下“把”字句的结构属性[J]. 当代语言学 (1): 75-100.
- 张伯江. 2014. 汉语句式的跨语言观——“把”字句与逆被动态关系商榷[J]. 语言科学 (6): 587-600.
- 张伯江. 2019. 说把字句[M]. 上海: 学林出版社.
- 朱晓农. 2008. 方法: 语言学的灵魂[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 Bickel, B. & J. Nichols. 2009. Case Marking and Alignment [G]//A. L. Malchukov & A. Spencer, *The Oxford Handbook of Cas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304-321.
- Burzio, L. 1986. *Italian Syntax: A Government-Binding Approach* [M]. Dordrecht: Reidel.
- Chomsky, N. 1981. *Lectures on Government and Binding* [M]. Dordrecht: Foris Publications.
- Comrie, B. 1978. Ergativity [G]. W. P. Lehman. *Syntactic Typology: Studies in the Phenomenology of Language*.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329-394.
- Comrie, B. 2013a. Alignment of Case Marking of Full Noun Phrases [EB/OL]. M. S. Dryer & M. Haspelmath. *The World Atlas of Language Structures Online*. Leipzig: 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Evolutionary Anthropology. URL: <http://wals.info/chapter/98>.
- Dixon, R. M. W. 1994. *Ergativity*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Dixon, R. M. W. 1997. *The Rise and Fall of Languages*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Du Bois, J. W. 1987. The Discourse Basis of Ergativity [J]. *Language* (63): 805-855.
- Etxepare, R. 2003. Valency and Argument Structure in the Basque Verb [G]//J. I. Hualde & O. de Urbina. *A Grammar of Basque*.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363-425.
- Facundes, S. D. S. 2000. *The Language of the Apurinã People of Brazil (Maipure/Arawak)* [D]. New York: University of New York.
- Haig, G. & S. Schnell. 2016. The Discourse Basis of Ergativity Revisited [J]. *Language* (92): 591-618.
- Handschuh, C. 2014. *A Typology of Marked-S Languages* [M]. Berlin: Language Science Press.
- Haspelmath, M. 2011. On S, A, P, T, and R as Comparative Concepts for Alignment Typology [J]. *Linguistic Typology*, (15): 535-567.
- Kishimoto, H. 1996. Split Intransitivity in Japanese and the Unaccusative Hypothesis [J]. *Language* (72): 248-286.
- Kruspe, N. 2004. *A Grammar of Semelai*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Lemmens, M. 1998. *Lexical Perspectives on Transitivity and Ergativity: Causative constructions in English* [M].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 Malchukov, A. L. 2015. Towards a Typology of Split Ergativity: A TAM-hierarchy for Alignment Splits [G]//A. L. Malchukov & M. D. Richards. *Scales and Hierarchies: A Cross-Disciplinary Perspective*.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275-295.
- Matthews, P. H. 1997. *Oxford Concise Dictionary of Linguistics* [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cGregor, W. B. 2009. Typology of Ergativity [J].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Compass*, (3): 480-508.

- Ochs, E. 1982. Ergativity and Word Order in Samoan Child Language [J]. *Language* (58): 646-671.
- Perlmutter, D. 1978. Impersonal Passives and Unaccusative Hypothesis [J]. *Berkeley Linguistics Society* (4): 157-190.
- Siewierska, A. & D. Bakker. 2009. Case and Alternative Strategies: Word Order and Agreement Marking[G]//A. J. Malchukov & A. Spencer. *The Oxford Handbook of Cas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90-303.
- Singh, J. 1994. *Case and Agreement in Hindi: A GB Approach* [D]. York: University of York.
- Smyth, D. 2002. *Thai: An Essential Grammar* [M]. London: Routledge.
- Thráinsson, H. 2007. *The Syntax of Icelandic*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Van Valin, R. D. 1990. Semantic Parameters of Split Intransitivity [J]. *Language* (66): 221-260.
- Whaley, L. J. 1997. *Introduction to Typology: The Unity and Diversity of Language* [M]. California: Sage Publications.

The Identification of Argument Alignment Pattern and Split Pattern Across Languages: Is Mandarin Chinese a Neutral Pattern Language?

YU Xiujin

Abstract: WALs classifies isolating languages such as Chinese as a neutral pattern language. This classification overlooks the argument alignment patterns realized by diverse non-morphological devices in such languages, which hinders research on the generative mechanism of argument structure. Given the underlying logic of the intra-clausal argument alignment pattern in languages of different morphological types, it is observed that: 1) Morphological case marking is not a universal marking device in world languages, and the alignment of case marking is not the only way to identify argument alignment patterns. In languages lacking morphological case marking, the patterns can be identified through word order, agreement, vocabulary and so on. ; 2) The neutral pattern advocated by the former typological studies should be cancelled, and the argument alignment pattern of isolating languages including Chinese, classified as neutral languages, should be re-examined; 3) Chinese is a nominative-accusative language with ergative-absolutive clauses, i. e. , a language with a split or mixed pattern.

Key words: argument alignment pattern; identifying means; split; nominative-accusative; ergative-absolutive

责任编辑:李小青